



香甜悠悠冻米糖

潘群飞

一直觉得，那个我无限留恋的年味是炒出来的，是土灶、铁锅、土特产共同激情碰撞出来的，香喷喷热乎乎。炒花生，炒瓜子，炒倭豆，炒芝麻，还有炒冻米。炒得热气腾腾，炒得香甜扑鼻，炒得人心欢畅。

当然还会有两声令小孩闻之精神一振的吆喝声助兴、“放炮仗”、“炒冻米哉”。放炮就是放爆米花。盛着干玉米、年糕片，大米的小箩、饼干箱队伍排得老长。一张张稚气的脸说说笑笑享受等待的快乐。老汉一手转动黑炮筒一手推拉风箱，不紧不慢，火苗忽高忽低地欢跳。到点了，一声巨响，一团白烟，一满袋爆米花喷薄而出。

“炒冻米”声，一般冬至后几天就开始在大街小巷洪亮起来。老人背着大铁锅大筛子，拎着铁砂和长柄锅铲，像江湖侠客似的。冻米，也作“冬米”，我们这边用的是经过冷冻的糯米。糯米用水饭筒蒸熟后，在寒冷的室外冻几天几夜，再在太阳下搓散晒干，粒粒坚硬剔透。这样的冻米遇热后，快速膨化，白黄相间，十分酥脆，做冻米糖时，表面微裂的小疙瘩有利糖水渗入，味道自然与众不同。大米爆的爆米花自然受潮变软后，再上锅小炒一下，也是一种口感不错的冻米。《板桥家书》记录“天寒冰冻时暮，穷亲戚朋友到门，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，佐以酱姜一小碟，最是暖老温贫之具”，关心百姓疾苦的郑板桥招待困潦之客果然也那么体贴入微。我们那儿好像也有糖茶上酒几粒冻米添香的习俗。

做冻米糖是个技术活，而且急不得，慢工才能出细活。我们村里有两位大妈深谙此道。每逢年底特别忙，请她们一般都要提前预约。我家的冻米糖年年由外婆包办。做冻米糖熬糖是关键。小火慢烧，筷子轻搅，香甜徐徐散发，待浓密的泡沫布满锅底时，再倒入一碗白糖，快速搅融，浓香烈烈。不时用筷子挑一挑，直到绵柔细长的粘丝出现。冻米、花生、芝麻一起下锅，大力搅拌，使糖与配料缠绵一体，难分难舍。出锅，平整，重压，冷却，切片，咔嚓作响。看外婆那认真劲，感觉她似乎在完成一项甜蜜的事业。做冻米糖时，总有不少邻居闻讯而来观看热闹，小屋暖烘烘的。橘黄的灯光下，浓浓的香甜和淡淡的烟雾氤氲着一张张喜庆的笑脸。第一锅冻米糖大多供大家试吃尝鲜。这一块块酥脆纯净的香甜，极大地满足了大伙寡淡多时的味蕾，并赢得了一次次悠长甜美的回味。

在我家做完冻米糖，外婆第二天清早乘泊在东边埠头的汽油船，携带工具、原料，去大姨家继续“上门服务”。嫁到余姚县城多年的大姨对乡下的棉布、菜子油、腌菜等土特产依然念念不忘，外婆的冻米糖更是他们一家人的美好期盼。大姨还喜欢自豪地与四合院的邻居一起分享，一做就是好几大箱。后来外婆患了严重风湿性关节炎，行动不便了，她才慢慢断了这份念想。就在前几年冬天，七十多的大姨居然打电话来，问我这儿还有没有老式的冻米糖？我费了好大的劲，才从邻村老人那儿弄来一小箱，给她寄去。大姨收到后来电：“很多年没吃了，还是老味道，哈哈……”听了内心很是感慨。她早已不是在品尝冻米糖了，而是在咀嚼一种难舍的情结，一片美好的回忆。

麦芽糖的回忆

李蓓莉

暖暖的冬日，我与麦芽糖在大街上不期而遇。太甜，太腻，质地松散，远非记忆中的味道。尘封已久的往事却一路呼啸而来：生于上世纪70年代，我的童年对于零食的渴望近乎空白，那些屈指可数的享受几近奢侈——

遥遥的春日午后，拨浪鼓好听的“的的笃笃”声由远而近，我知道久违的“兑糖客”来了。忙忙地收罗废牙膏管，晾在灶膛上的鸡肫鸭肫，晒干的鸡毛鸭毛，飞奔到村口，交给“兑糖客”检验，然后巴巴地等他把糖块交到我的手里。拿一块，迫不及待地放进嘴里，让麦芽糖特有的甜韧化了牙龈牙齿。吮着满嘴甜香，幸福地目送“兑糖客”挑着担子继续走村串巷。

爆米胖的老爷爷在年前的农闲时才会来村里。一个黝黑的手摇转炉，一个“凹”形铁皮火盆，一个拉杆风箱，一个长约三米的细口大肚竹筐，就是他的全部家当。“爆——米胖嘞——”大爷的吆喝中气十足，很快就传遍了小村各家各户。孩子们从浅浅的米缸里舀出一大杯米，从灶间柴堆里抽出三五片干燥的竹片；母亲从糖精瓶子里数出几粒用纸包好，再把一毛的角票塞到孩子手中。早有小伙伴抱着柴米攥着袋子缩颈等候了。大爷坐在背风的墙角，一手拉风箱，一手飞速转动摇炉，火苗呼呼地舔着他黑红皱纹的笑容。十来分钟后，大爷直起身，把炉口塞进竹筐，回头招呼：“爆嘞——”我们开心地捂住耳朵，“嘭”一声巨响，白烟腾空而起，绝大部分米胖乖乖跑进了竹筐，一些调皮的蹦出来散落在早已铺好的麻袋上。香气袅袅的第一炉米胖常常诱使孩子们欢天喜地地争抢。米胖袋子很轻，飞似的拎回家，母亲用细绳扎紧袋口，可以吃上十天半月。

过年前家家户户都会准备炒货。我家大锅里翻炒的是年糕干，葵花籽和倭豆。炒年糕干是个技术活，既花时间，还得沉住气，小火慢炒才能又酥又脆。母亲是个急性子，她炒的年糕干外焦里硬，让人嚼得牙床发酸。过完年，炒葵花籽、炒倭豆都吃完了，只有年糕干还躺在红漆的果桶里，但也因此可以吃到三四月。

城里的外公托人捎来口信，他要来看我们。我早早地踮起脚尖守候在村口的石板桥上，望穿秋水。终于，年过花甲的外公踏着夕阳的余晖急急赶来。他肩挑两个竹篮，篮子里是外婆和舅舅积攒已久的零食与“下饭”。看见我瘦瘦的身体拖着细细的影子站在焦黄的太阳底下，外公放下担子，心疼地牵起我汗津津的手，“囡囡，晒死了。我们回家。”我紧紧攥住外公的衣角小跑到家，两眼紧盯着他变戏法般从篮子里掏出花花绿绿的水果糖，绿色的苔条方饼，滚着白芝麻的小圆金钱饼，“囡囡，吃，快吃！”因为嘴里已经塞得鼓鼓的，我只能拼命点头。外公抱我坐在他的膝盖上，说着些我不能懂的话：“都是‘下放’害了你妈，也害了你们几个啊！”那天晚上我们兄妹三人在老屋的梁柱下踮来踮去异常开心，却不明白为何父亲比平时更沉默，母亲又一直冲着外公抹眼泪。

外公带来的“下饭”，几乎每回都是带鱼干、橡皮鱼干、乌贼鲞或是鳊鱼鲞。竹篮最底层是两条手背宽、银亮的新鲜带鱼，用塑料纸包了好几层，混杂着还未彻底融化的冰屑。当晚，细细地品咂红烧带鱼的美味，鲜香一路滋润着被咸菜土豆磨砺已久的喉舌和肠胃。没吃完的鱼干鱼鲞，母亲把它们用细绳穿起来系在长竹竿上，挂在老屋楼上咿呀作响的木窗前。

当然也有自得其乐的时候。放学路上，跃过那条田埂，把绿生生的萝卜连根拔起，在田边水沟里略略一洗，就抓着菜缨子嚼得脆响。田埂间的火堆烟雾冉冉上升，小昆虫们瞅准哪块地红薯长势最好，四顾无人，掀起纠缠的藤蔓，挖出几个埋进火堆。第二天放学，便可从隔夜火堆的余温里掏出焦黑的煨红薯，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。

光阴它有脚啊，恍惚间什么都没来得及抓住，二三十年就这么轻轻巧巧飞驰而过。多年以后，饮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与过去有了云泥之别。很多人因为担心营养过剩，已经自觉成为素食主义者。而我童年的记忆，那些苦难中的乐趣，朴素中的美丽，都如同池塘边的落落野花，只在某些宁静的午后或夜里，才袅袅生姿地在灵魂深处摇曳。

难忘童年美食

北燕

总有一些记忆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岁月的流逝，不仅不会忘记，反而日久弥新。在我的记忆深处，那些童年的美食，像一种深深的烙印，铭刻在心，时时想起……

先说馓子。馓子是一种古老的食物，以面粉搓成细绳，挽成环状，入油锅炸成金黄色，香酥无比，为南北之通食。《名义考》云：“绳而食之，曰环饼，又曰寒具，即今馓子。”

在西北地区家家都有吃馓子的习惯。一般在腊月底制作，过年时招待客人，在正餐前食用。因为父母都是南方人，所以我家里极少做馓子，都是住在隔壁的丫丫妈做好送给我家的，一送就是一小脸盆，够吃好几天的了。每次丫丫妈做馓子的时候，就预示着春节即将临近，我们几个孩子在厨房旁边跑进跑出，等第一锅馓子出来，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下手了。丫丫妈炸出来的馓子酥脆味香可口，一条条犹如金丝，简直就是一件美妙的工艺品。

再说糖麻叶，就是面加糖油炸的一种食物，很厚实的感觉，简简单单的味道，却有一种会让人思念的甜。糖麻叶一只只非常结实，记得住在石嘴山的时候，馓子只要三分钱一个，我买一个当早餐吃正好。而糖麻叶呢，一开始是一角钱一个，但是因为体积庞大，所以我最多一次只能吃三分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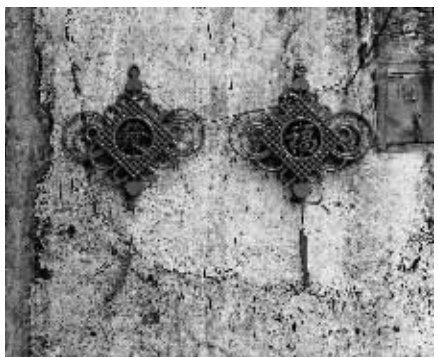
下面出场的就是油香了，油香又叫油饼，相传在元代从古波斯等地传入中国。油香种类和口味众多，有发酵面的咸味油香、淡味油香、甜味油香，还有烫面油香、发酵面油旋子等。油香外面酥酥的，里面软软的，让人回味无穷。2010年我带着女儿回去，和同学一起吃饭，席上有一盘油香，女儿是第一次吃油香，居然一口气吃了三只！把一旁的同学看得目瞪口呆。

馓子、糖麻叶、油香这三样油炸面食都是我小时候在石嘴山经常吃的，后来搬到大武口，喜欢在节假日的时候去旁边的平罗县赶集，平罗县的集市非常热闹，集市上的美食更是应有尽有，让我难忘的还有种小米炸糕，我记得那时是八十年代中期吧，一只小米炸糕一角五分，甜而不腻，每次和妈妈、弟弟去赶集总要买了吃，还有凉粉，坐在小吃摊上，我们仨一人要一碗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最后要说的是沙枣。在西北，沙枣树随处可见，我离开宁夏这么多年，总要想起那随处可见的沙枣树，我觉得那是西北性格最好的诠释。西北的春天来得迟，几乎到了春末，在一场接着一场的沙尘暴之后，沙枣树就那么悄悄，默不作声地开花了，每当我看到那灿烂金黄，像一个个小小的喇叭一样的沙枣花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夏天离我不远了。沙枣是我们小时候常吃的水果之一，微酸微甜，入口有一种绵绵的感觉。虽然多食涩口，但是我却百吃不厌，一边吃一边哼《宁夏民歌数花》：“沙枣子开花香天下，塞上江南好宁夏，东有黄河一条龙，西有贺兰山宝疙瘩，一马平川好庄稼，富饶花儿开，花开人人夸……”

前几年，有朋友从宁夏给弟弟带来了沙枣，弟弟特地送过来，女儿只吃了一颗，说：真好吃。我实事求是地说：“一点都不好吃了，怎么和小时候的沙枣不一样了呀。”弟弟直呼我忘本。我想，大概是因为时间和地点不同，我再也吃不出小时候那么好吃的沙枣了，就如鲁迅在《社戏》里所说：“真的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，——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。”

投稿邮箱 essay@cmb.com.cn



本版摄影 梁溪



69

我立即回答他：“我是一匹赶路的马，千里风尘之间，哪有时间洗刷自己？也顾不得别人的眼睛怎么看我，只顾睁着眼睛看前面的路。”

“说得妙！但是——”齐华紧逼着说：“你这匹千里马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眼睛，万一你的眼睛看到了自己的同类被一群豺狗围攻，难道视而不见？”

“好，机锋很健！”杨长勋看着我：“我同意齐先生的看法。那匹被围攻的马，是你，又不仅是你。你不能过于洒脱。”

我沉默了，端起杯子喝一口水。显然，他们说得有理。“那，你就给我简单介绍一下围攻的情况吧。”我说。

杨长勋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，翻开一页，看一眼，就说：“据我统计，这几年国内诽谤你的文章已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，这肯定不全；如果乘上每份报刊的发行量，那么，与你名字相关的恶言恶语在全国就是一个天文数字。放心吧，你肯定创造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遭受诽谤的历史纪录，不仅是中国纪录，而且是世界纪录。”

“他们哪有那么多话可说？”我问。

“起点是你发表的那篇《反盗版宣言》。由于影响太大，几个盗版集团都想封你的嘴，而你又软硬不吃。正好那个姓孙的‘石一歌’看你有名，在一些场合不清楚地说你是他的‘当年同事’，被北大一个与你同姓的学生听到了。这个余家学生在‘文革’时还是婴儿，就凭着臆想写了一篇文章攻击你，说你就是‘石一歌’，结果捅开了中国文人憋了很久的咬人劲头。盗版集团一资助，更是火上加油。看那些文章，好像都打了鸡血针。奇怪的是，报刊也像是中了魔，居然都白纸黑字地印了出来！”

杨长勋又从提包里拿出一大叠复印材料，逐一介绍起来——

“这是一个曾经把你吹捧为终极坐标的人，现在跳到了相反的终极，竟然说你谋害了周恩来的养女，可能要篡夺国家最高权力。”

我看到，齐华的嘴张大了，很久合不上。他好像也没有读过这种文章。

“这儿，湖南的一本杂志，说你在‘文革’中一蹶脚，大江南北都会颤抖。”杨长勋教授翻过几页，说：“更好玩的是，这个评论家说，中国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，可能是你在做中学生的時候发动的。”

“当然，胆子最大的还是南方那家周报，把那个姓孙的‘石一歌’当作了代表国家总结‘文革’的最高形象，整版整版地发表据说是他家里私藏了几十年的清查档案……”

“真是叹为观止。”齐华说：“这在别的国家，都是严

重的刑事犯罪，连报社社长都有可能要进监狱，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，都成了嘉年华？”

我的眼睛，还看着杨长勋手上那一叠复印件，他还只翻了很小一部分。

他瞟了我一眼，笑了：“还早着呢，再说两天都说不完。但我不说了，只想为你作一个概括。前面这些诽谤文章加在一起，给了你一个称号，叫‘文革余孽’。另外还有两个称号，一个叫‘文化杀手’，一个叫‘文化口红’。”

“文化杀手？”我问：“这听起来更严重。”

“这就是针对你反盗版。”杨长勋说：“你看，这是北京、广州、长沙报纸上的一堆文章，都在批判你的反盗版。他们一致认为，盗版有大功，是对国家出版体制的重要补充和勇敢探索，你第一个站出来发表声明反盗版，就是在扼杀一种新生的文化机制，因此是文化杀手。”

齐华又生气了，插了一句：“这就是说，谁反抗强盗，谁就是杀手！”

我说：“我根本还没有反抗呢，只说了几句话。”

齐华说：“我看市面上你的书，九成是盗版。印你的书就像印伪钞，但没有风险。”

我又把脸转向杨长勋：“怎么又是文化口红？”

“上海的一个文人揭露，有一个妓女也在读你的书，还把你的书与她的口红放在一起。因此判定你的书是文化口红，号召天下正经的妻子和丈夫都不要去碰。”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雄伟